

战火岁月砥砺前行^①

讲述者

庄励（1930—），广东番禺人，抗战时曾参加少年模范团、战地儿童教养院，江村师范毕业。1947年参加中共领导的游击队、护乡团、粤赣湘边纵队，一支三团当卫生员。1947年加入青年团，1952年参加共产党，1949年上调一支参谋处，当卫生队长，兼政治服务员、文化教员。新中国成立后，当土改片长，三灶区团委书记，珠海县团委书记，唐家区党委副书记，珠海南水大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珠海县委候补委员，中山小榄镇镇长，莲峰区办事处党总支书记、主任，石岐镇宣办主任。



庄励

耳濡目染 爱国华侨的抗战故事

我从小生长在广州。父亲是归侨，年轻时在东南亚行医，曾跟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早期的革命活动，加入过兴中会以及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国民党。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国共合作时期，在一次革命起义中，父亲被编入炸弹队。家里至今保存有一枚炸弹样式的铁制徽章。

20世纪30年代，我在父亲回到故乡广州后出生。回国后，父亲参加了华侨进步组织——“南洋华侨海外革命同志社”（简称“同志社”）。社址在广州长堤（东堤）大马路一间会馆的四楼。会馆门口挂有牌匾。因为

^① 摘自庄励：《战火岁月砥砺前行》，略有改动，题目与小标题为编者另加。

同志社开会都是茶话会的形式，备有西饼和蛋糕，小孩子喜欢跟着家长去，我在六七岁时就常跟父亲去开会。

同志社的会堂正中挂有孙中山画像和遗嘱，画像上的横额写着先生最为推崇的四个大字——“天下为公”。从小我在这里耳濡目染了许多爱国侨胞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出钱出力的事情。“九一八事变”后，大家聚在同志社开会。参会的群众很义愤。会上叔伯们喊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大家又一次聚在一起。与会者的演讲慷慨激昂，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抗日爱我中华！”的口号。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真切感受到父辈们的爱国热情和国弱被人欺的残酷现实。

小小少年 浓浓爱国情

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常来轰炸。一次，日机在我家对面同福路街口丢了一颗炸弹，震塌了许多房屋，炸死炸伤了好些人，我家也被震得摇摇欲坠。日寇的恶行，让许多广州老百姓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其中包括我和父亲。他创作了一些如“顺口溜”、“数白榄”之类的抗战粤曲，让我在人行道站在椅子上唱。他弹琴我唱歌，进行街头宣传。每次都引来很多路人围观，大家边看边鼓掌。哥哥姐姐也参加了抗日宣传队。

后来，有位进步军人卓教官，挑选我和一些青少年加入少年团，参与当时全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献金救国”的宣传。“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国民政府提出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保家卫国而战”号召。武汉、重庆、上海、广州等城市的民众纷纷为抗日捐钱出力，“献金救国运动”很快席卷全国。

为多发动捐款，我参加街头宣传。白天，我们10多个10岁左右的少年团员，从广州的河南走到河北爱群大厦13楼等地，集体唱抗日救亡歌曲，呼吁群众热心抗日，献金救国，购买飞机大炮打击日本，一连几天发动不少市民捐了善款；晚上，广州实行宵禁，如遇敌机轰炸警报，少年团就挨家逐户宣传，提醒各家各户熄灭灯光或炉火，以免敌机发现成为轰炸目标。

1938年初，卓教官在我们少年团员当中挑选表现积极的参加模范少年连。入选者将入营训练3个月，地点是广州登峰路原女中校舍。后来我才

知道这个模范少年团是中共地下党省委区梦觉等同志领导的政训团举办的。我和姐姐都被挑中。穿上蓝色军装，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在这里我们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团友。父亲特别支持我俩参加模范团。在少年模范团的日子，生活、学习均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训练、学习、夜行军，生活紧张而有序。每人配发一支木制假枪练习打仗，经常唱少年模范团的团歌：

巍巍白云山，群峰插天空；

汹汹珠江河，怒吼震亚东。

在营模范团，诞生于其中，

同志们，毋忘国难重重；同志们，记得报国尽忠。

拿着我们的热血，为民族的先锋，长奋斗，莫放松，大踏步，向前冲！犁扫奴隶，痛饮黄龙！

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的光荣！

1938年10月，抗战局势进入严峻时期。随着战局扩大，日军的侵略范围已遍及全国，逐渐逼近广州。10日，广州举行了十万人火炬大游行，号召群众誓死保卫大广州。广州各单位、学校全体动员参加。少年模范团、连也都参加。晚饭后6时，在中山纪念堂前集中开大会。会后游行队伍以整齐的步伐、歌声、舞狮舞龙、鼓乐队，举着火炬出发大游行。队伍像一条火龙，非常壮观。我们唱抗战歌曲和《广州少年兵》这首歌曲。那首响彻广州街头的《广州少年兵》是这样唱的：

广州市的少年兵，勇猛真无比。大佬细佬武装起来，时时准备，上前杀敌。广州市的少年兵，勇猛真无比！日本衰仔，汉奸乌龟，黎个食个，黎个食个，送佢返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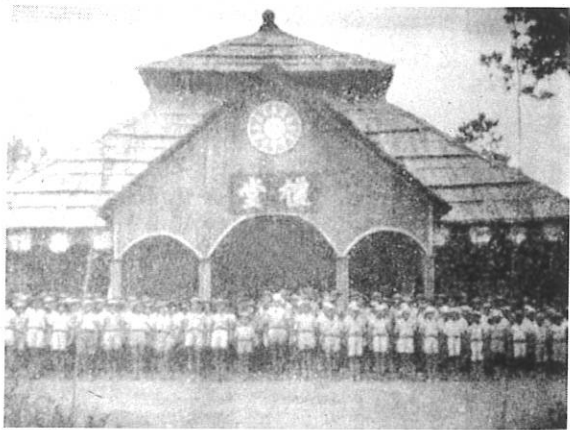
10月12日，日军板垣征四郎第五师500余人在200多架飞机、几百艘大小舰艇掩护下登陆深圳以东的大亚湾大鹏半岛。随后兵分三路，直驱广州。20日，广州沦陷前一天，模范少年连、模范妇女连、壮丁连等行军离开家园。我积极要求参加，但组织说我和其他3个同学年纪太小，让我们回家待命，随叫随到。当晚，我姐姐随着模范少年连夜行军，向着韶关

进发；我哥哥也随着抗日政工宣传队离开广州。我只能回家跟着父母逃难，但不知逃往什么地方。街上人心惶惶、混乱不堪。我亲眼看到大伙烧了海珠桥。熊熊烈火，满天通红，广州城陷入一片火海当中。

21日，国民党余汉谋部队撤出，广州沦陷。据估计，当时只有一万多人留下。广州人宁愿离开家园也不愿向侵略者屈膝。很多广州人冒着危险，进行地下抗日救亡宣传。沦陷后的广州，到处是日军的太阳旗，民不聊生。我堂哥被鬼子捉去打死；20多岁的堂姐不知下落，听说是被鬼子捉去欺凌；盗贼趁机打劫，我堂姐夫和他的爷爷被盗贼毒打致残而亡；两个表弟妹七八岁，到处流浪，据说被坏人拐了去。鬼子设置很多关卡，路过的人要鞠躬、搜身，还要挨毒打。这就是沦陷区的惨状，美丽的五羊城变成了人间地狱！

逃难韶关 苦难中思想日趋成熟

我姐姐庄静随模范少年连行军到达韶关后，来信让我们想方设法过去。1940年，母亲带着我跟着逃难的人群到了韶关。在后方抢救队帮助下，我见到姐姐，互相诉说别离后的艰辛，非常激动。姐姐告诉我，他们部队在曲江办起了妇女生产工作团。她介绍我认识了从中山县过去的杨子江老师（地下党）。杨老师借给我两本书，一本是《在苏联》，另一本是《在火线上》。我如获至宝，以后参军一直带着。这两本书对我教育启发很大。



设在韶关的总院大礼堂是广东儿童教养院的象征（网络图片）。

后来我没有再见过杨老师，这两本书却一直留在身边。

我父母亲辗转到韶关后，因年老体弱多病，先后辞世。十多岁的我成了家散人亡、无父无母的难童（走难儿童）。时任新运妇女促进会主任的抗日名将李汉魂夫人吴菊芳，为挽救民族

幼苗、积蓄抗战后备力量，组织了抢救队，到敌后及沦陷区，抢救烈士遗孤和走难儿童3万多人，以少年模范团为基础，成立了战时广东儿童教养院（简称“教养院”）。该院经济上由华侨赈济会支持。宋庆龄、廖承志等发动华侨资助。中共地下党在抢救队中成立了党总支，协助开展工作。教养院共有7个分院，我被安排在曲江沙园三分院，分院有1000多人。从此，教养院成了我们的家，老师像父母兄长那样关爱我们，每天上课、学习、操练，还边学习边劳动、种菜、煮饭；穿的是统发的童子军制服、棉衣、内衣裤等，生活虽然艰苦，但我感到很幸运。因为在这里，很多老师都是从广州来的，甚至还有地下党员当老师。



广东儿童教养院粤剧团的儿童在练功（网络图片）。

小学四年级时一次作文比赛，我联系家庭遭遇，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害我家破人亡、无家可归的罪行，并决心努力学好本领，将来为民族解放而斗争。这次比赛我获得第一名。此时恰逢江师开办，尽管我小学还没毕业，组织还是送我去就读。

1945年1月，日本侵略者计划打通粤汉线，韶关告急，学校实行大疏散。粤北地区冬天常下大雪，天气很冷。我们衣服单薄，有的还穿着短裤，脚长冻疮，但必须坚持走下去。否则，鬼子就打来了。当行军队伍走到老隆（地名）时天已黑。这时听到家家户户烧起炮仗，原来是除夕夜。大家都想起家。如果能在家与父母一起过年，该多好啊！我感慨良多，如果不是国弱被人欺，我们不会颠沛流离，有家不能回。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赶路途中最难忘的是过江西三南。三南（龙南、虔南、定南）属闽粤赣边区，中国工农红军曾经走过这里。登上罗坝山山顶，可以看到三省的

地方。行至九连山时，大雪纷飞，银装素裹，树梢上吊满了雪枝雪条，一片银白世界，江山如此多娇。不管行军多么疲劳，稍有空隙老师们就会给我们讲课。一晚，我们到了一条人称三家村的小村。我和其他3个女同学分配住在一户人家的猪舍，下边铺些稻草，与猪住在一起。寒冷和疲倦使我们倒下就睡。第二天天未亮，就被几头大猪吵醒，原来我们霸占它们睡觉的地方。那一刻，我们开心地笑了。战斗中成长的青春就是这样磨砺出来的。

令我非常激动的是，这一次行军中我见到了共产党员！我姐夫李群听说江村师范学校的学生来了，专门找到这里与我见面。在教养院时，我常与他通信，谈个人的理想和追求，但见面还是第一次。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翁源龙仙区的中共地下党委书记，而我姐姐就在附近的龙仙小学教书，她的真实身份是地下党联络员。姐姐到韶关后，在进步组织介绍下参加了粤赣湘边纵队从事地下党工作，在艰苦的岁月中认识了同为地下党的姐夫，成为一对革命夫妻。他们以教书为掩护，一边为学生上课，一边传播革命火种。这次见面，让我对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有了初步的认识与了解。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从江村师范毕业。毕业后我回到广州，已经举目无亲，父母不在、亲人离散。幸好教养院的老师同学纷纷伸出援手。好朋友陆碧珍让我到她家暂住，并介绍我去附近的小学教书。刘明（中共地下党员）同学又介绍我到番禺钟村小学任教。期间，我接触了很多进步人士。同学郑泳的哥哥郑震在香港糖果面包工会工作，每次他都把香港寄给他的进步书报转寄给我。我在这个时期如饥似渴地阅读《华商报》《正报》《解放日报》《政治经济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进步报刊和书籍。后来，郑泳觉得时机成熟，带我到广州市仁济路一间小楼处开秘密会议，聆听地下党人梁克寒老师讲述当前的形势。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的腐败让我们感到失望。我们一致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有学生家长偷偷告诉我：“你的很多邮件寄来时有人偷看。上头说你是‘八字脚’、‘八哥’（即共产党之意，共字是八字脚的）。要小心，会被列入黑名单的。”我并不害怕，经过战火的洗礼，我已经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找到光明的明天！

【延伸阅读】

战时广东儿童教养院

1938年秋，日寇的铁蹄践踏在南粤大地，广州一带相继沦陷，广东的政治中心转移到粤北，曲江成了广东战时省会。其时著名爱国将领李汉魂任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其妻吴菊芳则被派任广东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肩负全省妇运和儿童教养工作。

战争的到来，使广东各地很多儿童时刻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李汉魂和吴菊芬出于抚孤爱国的赤子之心，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同，以及社会进步人士、爱国华侨等的鼎力支持下，经过亲赴重庆向当局请款抚养军人遗孤、抢救战区难童，获准成立了广东省战时儿童训练团，团址设于韶关曲江沙园，由一处蔗田中一个废弃的榨糖厂里的仓库改建为课堂和宿舍，晒蔗渣的广场改成操场。后来因收容的儿童越来越多，1939年8月，训练团改名为“广东儿童教养院”，并在连县、仁化、南雄等地开设了7间分院。

“儿教院”组织了10多支战区儿童抢救队。抢救队员们分成不同的小组，不顾生命危险，冒着战火，深入到各战区、沦陷区，说服难童，劝导难童家长。经过努力，许多难童被收容到各地的收容所。有2万多名难童在抢救队员的保护下，集中跋山涉水，越日军的封锁线，或步行、或乘船，从珠三角、粤东、粤西等地护送到粤北大后方——曲江，送进广东儿童教养院，进行施教施养。被抢救到粤北的难童中，有300余人是从香港抢救过来的，其余大部分来自湖北、江浙等地。为适应学生升学的需要，在1940年9月又陆续创办了实验中学部、北江师范学校和北江农工职业学校。

从战地和沦陷区收容回来的儿童，年龄在7、8岁至17岁之间，男女都有。吴菊芳亲自任院长并为之付出大量心血。她聘请当时的中山大学研究院院长崔载阳博士为儿教院教育顾问，经研究制订了一整套适合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方案和发展规划。所有被收容者，由公家供给衣食和课本等读书资料，在“儿教院”“管、教、养、卫”的办院方针下避开时局的影响，努力成长，不少后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战时广东儿童教养院，谱写了不屈不挠的抗战壮丽诗篇。

(综合整理)